

20世纪80年代乡土小说的家族伦理书写^{〔*〕}

田 丰

(河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摘要〕新中国成立之后明令禁止依仗封建族权族规剥夺个人婚恋在内的身体自主权,对于那些危害个体身心健康乃至危及生命的家族陈规陋习进行了清理,后果严重者还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从而极大地限制了封建族权。然而由于乡村传统家族伦理道德观念浸淫日久而无法轻易消除,加之聚族而居的传统生活方式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因而在广大乡村传统家族伦理道德依然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力。1980年代随着商品经济时代的到来,中国的家庭结构和功能定位也发生了根本变化,由于乡人们经济意识的觉醒和个体自主意识的不断提升导致传统家族逐渐分化解体,族规族约所能起到的威慑力大不如从前。然而这也并非意味着传统文化已经彻底消弭殆尽,在广大乡村依然是颇为强大的存在。

〔关键词〕1980年代;乡土小说;家族伦理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3.06.011

中国传统社会建立在农耕文明之上,乡土民间由众多家族组合而成,以至于中国传统社会制度便是家族制度,无论是皇亲贵族还是普通农家莫不以家族为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构筑起家国一体的统治架构和社会秩序。中国传统家族伦理之所以能够传承两千余年而绵延不息显然自有其合理性,甚而可以说“‘家族’是中国文化一个最主要的柱石……先有家族观念乃有人道观念,先有人道观念乃有其他的一切”。^{〔1〕}然而传统家族伦理对于人心的钳制和人性的束缚也是异常鲜明的,五四启蒙者之所以将斗争矛头对准

封建家族伦理观念,正是缘于他们曾经切身感受到其所造成的心理重负,因而清醒地认识到唯有打倒封建家族制度方能将无数青年解放出来走向广场、走向社会。清廷的覆灭宣告着中国绵延数千年家国一体统治架构的彻底瓦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乡村基层政权的建立和巩固更使得封建宗法势力遭受前所未有的限制,但由于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和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因而家族仍然是基础性的社会单元。1980年代随着商品经济时代的到来,中国的家庭结构和功能定位也发生了根本变化,由于

作者简介:田丰,文学博士,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20世纪80年代乡土小说。

〔*〕本文系201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乡土小说与乡村文化变迁的关系启示研究及文献整理”(19ZDA273)的阶段性成果。

乡人们经济意识的觉醒和个体自主意识的不断提升,开始更为注重个人生命价值和个体生活幸福,传统家族逐渐分化解体,为数众多的乡村青年开始向城而生,族规族约所能起到的威慑力大不如从前。然而这并非意味着传统家族文化已经彻底消弭殆尽,在广大乡村依然是颇为强大的存在。

一、传统家族伦理观念所导致的 人性戕害及精神创伤

中华民族自古以农立国,原始落后的农业生产条件使得人们必须固着在土地之上并且相互协作方能求得生存,由此逐渐形成安土重迁、聚族而居的生活习惯,以血缘为纽带构建起绵延数千年的封建家族宗法制度。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上形成了调适、求稳的价值准则和文化心态,强化的是个体必须服从集体、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家族利益的行为准则和处世之道,推崇的是整体本位主义的精神价值观念,极度压制和贬抑个体价值及个性观念。中国传统儒家家族伦理是典型的他律人格伦理,强调要在“仁”“义”道德规约下来构建个体人格和实现个人价值,真正占据主体地位的不是个人而是以仁义为核心的道德规范。这是缘于“仁”“义”界定标准外在于个体而无法自我标榜,必须由他人来进行认定,由此使得践行仁义者时常不得不以丧失自我个性为代价,正所谓“克己复礼”“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其核心特征是“毋我”。总的来看,以宗法观念施行仁义的封建家族制度重集体而轻个人,重义务而轻权利,重守成而轻创新,极大地压缩了个人自由发展的空间,不仅严重抑制个体自我人格形成和积极主动性的发挥,而且也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创新活力和发展动力。五四时期思想启蒙者都有过遭受封建家族伦理压迫的亲身经历,尤其在两性情感上不得自主的感受最为直接也最为强烈,因此他们在获得自我解放之后首先便将矛头对准中国传统宗法伦理观念。新中国成立之后,政府明令禁止仗仗封建族权族规

剥夺个人婚恋在内的身体自主权,对于那些危害个体身心健康乃至危及生命的家族陈规陋习进行了清理,后果严重者还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从而极大地限制了封建族权。然而由于乡村传统家族伦理道德观念浸淫日久而无法轻易消除,加之聚族而居的传统生活方式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因而在广大乡村传统家族伦理道德依然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力。总的来看,中国传统家族属于黑格尔所说的伦理实体,同一家族基于共同的血缘关系以爱为伦理法则构成伦理共同体,人作为伦理共同体的组成部分不再是孤立的、独立的个体;然而与此同时也使得每个家族成员都承担着各种形式的道德义务而备受伦理束缚和道德钳制,人性非但无法自由舒展反倒时常会遭受戕害而导致人的精神创伤,这在1980年代乡土小说中也有着鲜明的体现。

首先,中国传统家族伦理制度是以男性为主导设立的权力结构模式,女性处于从属地位,只能凭缘而不能由爱来决定择偶对象,从而导致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幸。

1980年代虽然许多乡村女性在政策和法律支持下大胆冲破封建家族伦理枷锁,但依然有很多未能摆脱束缚而遭受身体磨难和精神摧残。封建家族伦理是典型的群体本位的伦理文化形态,尤其是传统家族中的女性在两性情感方面更是几乎完全丧失自主权,由此造成严重的身心伤害。彭见明《青龙水库》、王安忆《小鲍庄》《大刘庄》等作品即涉及族中长辈对于家族成员自由恋爱的横加干涉,使得原本美好的爱情遭受摧残乃至酿成惨剧。《青龙水库》中的朱氏家族人多势众且严格奉行传统家族伦理道德,就连党员队长也得看族中长辈眼色行事,更遑论一般家族成员。心地善良的哑女帮着患有痲病的父亲将弟弟妹妹们辛苦拉扯大,但因着天生聋哑而被家族视为多余人,对于她的婚嫁大事毫不关切。然而哑女在参加水库修建时与男人偷情怀孕事发后却在家族中掀起轩然大波,遭到族中长辈的审问和毒打,族长为了维护家族颜面竟然让人用脚猛

蹬哑女的肚子想要打掉胎儿,所幸干部及时出面制止方才保住性命。孩子出生后哑女父亲不仅与她断绝父女关系,而且授意族人遵照族规要将她绑着淹了,所幸族中人并未照此执行,而是霸蛮地将哑女母子扔在水库管理所了事。王安忆《大刘庄》中同为刘姓但已出五服的迎春和小牛心心相印,却因违背传统婚嫁习俗而遭致家族成员反对。苏童《妻妾成群》《罍粟之家》、莫言《红高粱》、刘恒《伏羲伏羲》等作品中的男性家长为了金钱罔顾女儿的终身幸福,由此导致凄惨的结局。傅恒《花花》中花花的母亲先后将自己的五个女儿都许配给自己亲族中的侄儿们,花花的三姐因不愿和恋人分离而投水自尽,母亲又让花花接替三姐嫁给表哥。莫言《天堂蒜薹之歌》中的金菊只因是女儿身平日里受尽虐待,长大成人后原本憧憬着美好幸福的生活,然而她与高马真心相爱却无法结为夫妻。金菊的父母为了给大儿子娶亲,与刘、曹两家订立了换亲的“三家条约”,一心寄希望于依照《婚姻法》保护婚姻自主权利的高马却被从乡政府赶了出来。金菊和高马无奈之下选择私奔,但很快便被乡政府杨助理员抓回。后来高马因为蒜薹事件带头冲击县政府被抓入狱,即将临盆的金菊无人照顾,绝望之际上吊自杀,在她死后大哥和二哥竟以八百元的价格将其尸骨卖给曹家结阴亲。

其次,中国传统家族伦理道德观主张个人利益服从家族利益,为了延续家族血脉或者完成家族使命而引发自我主体失落。

对于严密遵循封建宗法制度的家庭而言,女性能否生子成为关涉家族未来的头等大事,也是女性确认自己在家庭中地位的重要保证,如同恩格斯所总结的那样“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2]由于长期受到传统家族伦理道德观念的熏染,久而久之形成重群轻己的家族本位观,事无巨细都以家族利益作为个体行为处事的判断依据,从而亦步亦

趋地奉行儒家传统家族伦理道德而导致个体自由受到限制。许谋清《赤土路上的送葬队伍》中的乌掐因为生育了三个儿子而圆满完成延续家族香火的使命,为了养育儿子在世时她含辛茹苦、受尽磨难,去世时也得享风光无限的隆重葬礼。相较而言《死海》中的乌昌却因为断了子嗣而下场凄惨,村人们非但不关切同情乌昌的丧子之痛,反倒秉承“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祖训当面斥责她,这使得她背负着沉重的道德重负,不得不同意雇人育子。刘恒《伏羲伏羲》对人性和人伦之间的矛盾纠葛进行了深入揭示,年近五十的杨金山为了完成传宗接代的家族使命不惜将三十亩地中的二十亩作为聘礼迎娶年方二十的王菊豆为妻,他在将青春貌美的王菊豆视作传宗接代工具的同时,实质上也使得自身沦为延续家族血脉的工具性存在。莫言《欢乐》中的兄嫂深受传统家族观念熏染,生儿子几乎成为他们唯一的人生目标,为此人性逐渐发生变异,一个变得懦弱自卑,而另一个则凶悍刁钻。

张炜《古船》中的隋氏家族成员虽然维护家族利益与尊严的方式和程度有所不同,但其实都难以完全摆脱家族伦理观念的拘囿。主人公隋抱朴在人生的绝大部分阶段似乎都在守着“无我”“丧我”的道德律令,固守着父债子偿的传统家族伦理规约而一再声称自己是老隋家的罪人,要替隋氏家族赎罪。表面看来他放弃了家族复仇,但实际上身为隋氏家族长子的他始终无法忘却家族使命和家族责任,为此甘愿舍弃个人情感欲望。为了存续家族起见,他不仅自我克制和牺牲,同时也极力阻止弟弟隋见素挑起家族之间的纷争,以免隋氏家族遭受灭顶之灾。进入新时期之后有着经营才干和技术能力的隋氏家族重新获得施展的舞台,隋抱朴在看清形势之后终于决定走出磨屋。在赵多多车祸身亡后,隋抱朴出任粉丝大厂总经理,下决心要重塑家族事业的辉煌。抱朴在即将出任总经理时与见素所说的一番话暴露了他的心迹,他说如果见素夺走了粉丝厂,他被打倒在地也会从地上再爬起来将见素打

倒的,由此可见隋抱朴始终没有忘记自己作为长子所肩负的家族使命。荣格曾经说过:“不是人支配着情结,而是情结支配着人”,^[3]家族长子在成长过程中往往要比其他同辈家族成员接受更为严格的训诫,也承继着最为重要的家族使命。长子相较其他人而言受到封建传统礼教的束缚程度要大得多,尤其在家道中落时为了支撑家族门面往往要付出很大的牺牲,长子情结时常会禁锢住他们作自由选择的想法,而在重家轻己的长子情结驱使下行事。在小说末尾,隋抱朴预言老隋家还会出下洋的人,这预示着恢复家族荣耀的雄心,承续了要将粉丝业发扬光大、走向世界的家族梦想,然而为了避免给隋氏家族招灾惹祸,他也不得不承受着无法和心上人小葵结合的终身遗憾。郑义《老井》中的孙氏家族世代肩负着为村里打井的重任,这在因水源奇缺而水贵如油的旱山是直接关乎着人们能否生存的头等大事。久而久之打井不仅成为孙氏家族的家族使命,并且在这其中也浸润着家族荣誉感,也正因为孙旺泉从出生之日起便被寄予重建家族荣光的厚望,同时也背负着沉重的家族伦理重担,为此而不得不压抑自我真实欲求。孙旺泉原本可以和心上人赵巧英共同到大山之外开启新的生活,但却因不愿违逆家族伦理道德而选择将生命之根深植在太行山里,“他顺遂了爷爷,照顾了兄弟,也给段家接续上了香火,单单坑害了一个爱他爱得刻骨铭心的女人”。^[4]孙旺泉为了家族荣誉可以牺牲个人的一切,此种自我牺牲精神固然是值得钦佩的,但却是以个体自我的失落为代价,在履行家族道义责任的同时也使得真心爱着他的巧英受到严重的心理伤害。王安忆《小鲍庄》通过描绘鲍氏家族日常生活情态,对传统儒家家族伦理进行了反思和揭示,小鲍庄可以视为中国传统社会的缩影,仁爱精神是处理家族内部人际关系的重要准则,然而在仁义背后却也潜藏着对于家族个体成员正常人性欲望的压制和禁锢,对于个体利益的侵夺更是生活常态。捞渣自幼便秉承着儒家仁义道德观将自我欲求压至最

低限度,作为“仁义之子”他满足了传统伦理道德规范的要求,但也由此造成生命活力的极度压抑和个体价值实现的严重束缚,使得个体沦为集体意志的牺牲品。

再次,家族作为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是以血亲关系为纽带,按照亲疏远近形成同心圆式的社会关系网络,其根本宗旨是要维护家族利益。为了达成这一目的,一方面在家族内部始终遵循和强化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礼俗观念,并对胆敢违拗者实施严厉惩戒以维护家族内部的和谐稳定;另一方面也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专制性和残忍性,一有适当时机便会肆意欺凌外姓人以维护狭隘的家族利益。

中国封建社会时期为了加强对于广袤的乡土民间的控制往往会赋予家族族长种种特权,同时又以连坐等方式倒逼着家族加强对于其成员的管控和约束,当家族成员有违规之举而让家族蒙羞时族长便会依照族规族约先行惩戒,尤其对于通奸、乱伦等严重有悖人伦的行为会施以沉潭等严酷惩罚,以此来维护家族声望。谭谈《罪过》中的寡居族婶大香与李晓雷日久生情有孕在身引起李姓族人公愤,纷纷登门兴师问罪,“这事太丢我们李姓族人的脸,有辱我们的先人。就是政府不处置,我们族上也要惩罚他们一下。过去,族里出了这样的事,那还了得,早就用扮桶罩起来了,然后开祠堂门,把有辱先祖的逆子叛妇,绑到楼梯上,沉到大仙湾前面那个深河潭里淹死了。我年轻的时候,是亲眼看到沉过潭的!”^[5]沉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早已严令禁止,李姓族人在七嘴八舌商议处置办法时业已认识到“对男的,今天当然不能再捉去沉潭了”。^[6]大香与晓雷一起逃离家乡生下孩子后在夫家和娘家两个家族的协力逼迫下无奈仓促嫁给年近五十且身有残疾的篾匠师傅。韩少功《爸爸爸》中的鸡头寨人家族观念之所以极其强烈与其面临的生存压力有关,家族是否团结以及家族势力是否足够强大直接决定着整个家族的生死存亡。也正因为此鸡头寨人在与鸡尾寨人械斗时全体上阵、视死

如归,最终因落败而不得不迁移别处,在临行前为了避免拖累整个家族按照族规,老小残弱都要饮毒水而死,对此他们都能坦然接受。

地理位置偏僻而又交通闭塞的地方习惯上往往由家族族长代为处理外部事务,很多村民终其一生也没有见识过外界天地,对于家族族长有着强烈的人身依附心理,不可能也不愿离开世代居住的村落到外面闯荡,同时又对非我族类者衍生出强烈的排外心理。朱晓平《桑树坪纪事》中的李金斗和张炜《古船》中的赵炳等人在乡村扮演着类似马克思所说的“天然首长”的角色,他们之所以能够掌握乡村权力主要凭恃的是家族势力。赵炳在洼狸镇赵氏家族中辈分最高,又在早年间参加革命成为最老的党员,这双重身份使得他在洼狸镇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集家族族长和指导员于一身,但赵炳更为看重的却是如何获取和维护家族利益。朱晓平《桑树坪纪事》中的李姓人家原本是一村一姓一族,因此“村里人很讲究辈份(分),宗法观念很重”,^[7]由于他们长期生活在封闭的狭小天地里,对于外界事物缺乏参照系而满足于祖辈延续下来的生活秩序,严格遵循传统伦理道德观而并无不适之感,由此形成缺乏包容的生活习性,对外来者怀着警惕和敌意。李金斗之所以能够在村子里说一不二主要凭恃的是宗法权威而非基层干部的政治权威,他是作为李姓家族代言人被推举出来的,一心所要维护的只不过是家族利益。也正因此李金斗对于家族内外的人事处理上判然有别,对外姓人加以利用的同时时刻防范着,一旦外姓人触及李姓家族的利益时便会遭到残忍的打压。李姓家族对知青“我”、王志科、窑客老吕甚至叶落归根的李言老汉等都带着敌意,为防止侵占利益而拒绝他们融入。王志科原本入赘李家,在丈人妻子相继去世后李姓家族觊觎他所住的那孔破窑而污蔑他是杀人犯,对其进行残酷迫害。以李金斗为首的桑树坪人给彩芳、王志科等人造成严重的身心戕害,并迫使彩芳走上不归路,但究其本质而言他们又并非极恶之人,正如

作者朱晓平所言的那样“我从心里觉着金斗是好人”,“对桑树坪人,我没有一个恨的。都是好人,都是可怜人”,^[8]之所以会酿成惨剧主要是狭隘的封建家族伦理道德观念使然。张炜《古船》中的赵炳身为赵氏家族辈分最高的人在家族内部掌控着话语权,同时他还精通权术,借阶级革命之名行家族复仇之实,“以貌似革命的形式实现宗法斗争的复仇目的”,^[9]成为洼狸镇人命运的主宰。赵炳对于自己当年能够带领赵氏家族击败曾经声名显赫的隋氏家族一直引以为傲,不仅对隋氏家族的财产进行大肆侵夺,而且还强占隋含章以满足自己的欲望,作为洼狸镇几十年的实际统治者他在给个人以及赵氏家族带来丰厚利益的同时也对革命事业和其他家族人员造成了严重损害。

二、传统家族伦理的衰微和变异

传统农业社会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个体抵御自然灾害和外界袭扰的能力十分有限,唯有聚合起群体之力方能求得生存,因着血缘关系聚合起来的家族正可以满足人们渴望获得安全感的心理需求,当灾害来临之际那些世家大族还有族田族产来为族人提供及时救助。五四时期传统家族制度在反封建主义思潮的强力冲击下逐渐趋于削弱,土改运动时所奉行的将族田在内的所有田地收归公有的政策又从根本上瓦解了封建家族得以维系的经济基础。进入商品经济时代后社会分工日益精细,人们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飞速提升,个体生存能力有了很大提高,不再像农耕时代那样经常需要集合家族群体力量来应对危难,家庭结构不断向着小型化方向发展,核心家庭和主干家庭替代传统家族成为主要家庭结构形式。“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随着政治局势的逐渐稳定和法制观念的逐步推进,中国乡土民间正在从礼俗社会转向法理社会,传统宗法伦理观念和道德规范渐渐失去以往的效力。虽然传统封建家族并非全是负面因素的集合体,对于农耕文明的生成和延续也有过巨

大贡献,但与现代社会却不相协调,传统家族本位的社会结构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化要求,唯有打破传统家族制度将个体从家族束缚中解放出来方能激发起社会的创新活力。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人们的个体自主意识也开始觉醒,生产经营方式趋向开放性、多元化和市场化,传统家族伦理规范面临着逐渐衰落的必然结局。相应地1980年代乡土小说家族叙事的关注点也逐渐从革命、斗争、叛逆等阶级话语中解脱出来而转向对于人性欲望和个体自由的呈现,注重从人性角度来展现传统家族伦理的腐朽、虚伪及其必然走向崩溃的命运。家族成员也会因汲汲于个人私利而打破传统家族伦理规约,从而导致家族亲情淡漠和家族伦理衰微。苏童《1934年的逃亡》《罍粟之家》《妻妾成群》、刘恒《狗日的粮食》、莫言《红高粱》、陈忠实《四妹子》等作家作品都显示出带有悲剧色彩的家族衰败史。

苏童《1934年的逃亡》中的枫杨树半个村子都姓陈,然而由于年代久远旁系不断分出,家族成员之间的亲情也因远近亲疏而不断变换。地主陈文治和手艺人陈宝年在陈家族谱中可以追溯到血缘关系,然而两人之间却因着经济条件的差距而形成攀附关系,陈宝年不顾同族不婚的家族禁忌将美丽绝伦的妹妹凤子许给陈文治作妾换回十亩水田。由于是近亲结婚,凤子接连产下三个畸形男婴,经受不住连番打击变得疯癫。后来陈宝年在城里经营竹器暴富,但奢靡无度的他却罔顾家族责任,结果致使五个子女死于瘟疫,侥幸逃脱的儿子狗崽也因与他争夺情妇落败抑郁而终。《罍粟之家》中的地主刘老侠虽然通过种植罍粟获得巨额财富,但刘氏家族却如同妖艳的罍粟花一样在无比光鲜的外表下潜藏着致命毒性。为了满足财色欲望他毫不顾惜家族伦理亲情,与父亲的姨太太野合生子并结为夫妻是为不孝,趁着弟弟危难之际侵夺财产是为不悌,对于儿子演义和女儿刘素子缺乏关爱是为不慈,从而注定了家族必然走向覆灭的命运。刘恒《狗日的粮食》中天宽娶了瘦袋女人后两人辛苦劳作秋

天收获了吃不完的山药,但叔伯兄弟杨天德上门借粮时却遭到拒绝空手而归。待到生儿育女变成八口之家时天宽不得不向别人借粮,洪水峪民风淳朴不肯出借者寥寥无几,而天宽就是其中一个,家族亲情因着危难之际缺乏相互体谅和相互帮助而荡然无存。

1980年代乡土小说还巧妙地运用隐喻象征手法来呈现家族衰败史。莫言《老枪》中的祖传遗物猎枪见证了神秘而又悲怆的家族历史,奶奶为了维系家族生存用它击毙了嗜赌如命的爷爷,父亲则将枪口对准了自己,儿子因着饥寒所迫违背母训偷偷摘下老枪打野鸭子时又意外丧命。《红高粱家族》中在具有英雄气质的余占鳌、罗汉大爷等红高粱家族成员的映衬下,后辈就像漫地的杂种高粱那样发生种的退化,丧失了桀骜不屈的家族血脉传承。越出常规的无字之碑也隐含着耐人寻味的讯息,徒然延续着传统的丧葬文化习俗形式却丧失了精神所指,由此昭示着传统宗法伦理名存实亡的衰微景象。《罍粟之家》中的刘氏家族就像罍粟花一样在光鲜亮丽的外表之下慢慢聚合着毒性,阶级斗争等外部政治运动起到了加速原本已无可挽救的家族衰颓和覆灭的必然命运。

事实上传统家族的维系并非单纯依靠族长权威,同时也需义字当头,兄友弟恭、妯娌和睦,源自一母同胞的骨肉亲情是家族维系的重要支柱,否则的话便会因矛盾重重而导致家族分崩离析。封建家族观念之所以能在中国盛行数千年与小农经济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落后的经济文化条件有着直接关联,同财共居是宗法家族制在日常生活方式上的重要体现形式,家族中的家长在安排家族成员日常起居、劳作事务以及家用开销等方面都有着绝对的掌控权。事实上传统家族不仅传承世代积累的财产,同时也传递生产技能和管理能力,通过代际传承的方式使得家族所积攒的财富、经验乃至社会地位都能够延续下去。然而到了商品经济时代社会发展日新月异,致富渠道的多样化使得代代相传的生产技能和

积累的经验失去用武之地,家族长辈不再像过去那样能够从容应对时局,逐渐丧失话语权威,自然也失去了往昔所受到的尊敬。余华的诸多作品都对传统家族伦理进行了无情的颠覆,对传统的封建孝道进行了拆解和否定,《现实一种》中的家族成员间形同陌路,全无母慈子孝、兄弟怡怡的传统伦理情感氛围,最终兄弟之间相互残杀上演了一幕人伦惨剧。由于长期从事乡村基层工作,陈忠实对根植于黄土地的家族文化心理有着深刻的领悟,“缓慢的历史演进中,封建思想封建文化封建道德衍化成为乡约族规家法民俗,渗透到每一个乡社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族,渗透到一代又一代平民的血液,形成这一方地域上的人的特有文化心理结构”,^[10]同时他也对家族文化心理随着时代转换所发生的演变状况进行了深入揭示。《四妹子》中吕克俭因家庭成分高在村子里原本毫无地位可言,但却由于家法谨严而引起村民们尤其是老辈人的羡慕。“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随着外在政治限制的解除吕克俭在家族内部也失去了往日的威权,为了彻底解决儿子儿媳们之间的纷争不得不分家。分家后有着经济头脑的四妹子生意兴隆,在筹划养鸡场时需要人手,吕克俭为了让四妹子帮衬另外两个儿子家共同致富提议兄弟三家联合经营。四妹子念及家族亲情也为了免去雇工剥削之嫌欣然同意,却不料老大老二两家合伙算计将她多年辛劳积攒的家业瓜分一空,吕克俭自此方才认识到“现在的人心是朝着分字转,分得越小越好,分得越彻底越满意。在这样大水决堤般的时势里,自己却逆时背向,把已经分了家的三兄弟联扯到一起,岂能有完美的结局?岂不愚蠢透顶!”^[11]周大新《家族》中的周五爷随着年岁渐长成为周氏家族的“长老”,但却更像是被时代抛弃的遗老,与后辈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思想鸿沟。他本人也无法弄清祖传遗训的意义,只能从家族悠久辉煌的历史中获取些许精神安慰,由此昭示着传统家族伦理随着时间推演只存在于历史记忆中却丧失了内在灵魂,因而必然会走上没落的时代趋

向。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周氏家族的年轻一代彻底否弃了“和为贵”的家族遗训而展开金钱角逐。

现代文明观念的传播和普及也对传统家族伦理道德构成了极大冲击,在削弱传统家族威权的同时也逐渐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从而大胆冲破传统家族伦理规范的束缚而迎来新生。蓝怀昌《曼里寨新歌》中的壮瑶两村寨虽然树相依、楼相望,共开一山地,共种一坡林,但在婚姻方面却世代秉承着互不通婚的家族禁忌。瑶族青年何阿狗在十八岁前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当母亲何娅妮告知他的父亲是壮族人时他首先想到的却是要遵从传统禁忌杀死自己的父亲。后来在黎维纲的耐心开导下何阿狗的思想逐渐发生转变,何娅妮和韦芒索也终于突破传统家族伦理观念束缚成为眷属。贾平凹《周武寨》中的周氏家族和武氏家族祖辈便结有仇怨,在“文化大革命”武斗中相互厮杀,然而在历经劫难之后后辈却化干戈为玉帛,周家母子与武家组合成新的家庭。

三、传统家族伦理的回归与认同

传统家族通过伦理规约在家族内部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使得每个家族成员都能产生灵魂有所依托之感,在危难之时相互扶持共渡难关,从而满足安全感和归属感的情感需要。然而,越是如此便越有可能造成群体意志对于个体自由的剥夺和控制,使得家族成员产生偏离群体的无助感和恐惧感。中国现代作家诸如鲁迅、郭沫若、茅盾等都对封建家族制度进行过猛烈的抨击和尖锐的否定,但由于他们自幼都受到过封建家族伦理观念的熏染而难以彻底与封建家族决裂,所以同时兼具封建家族的反叛者和孝子贤孙这双重身份。相较而言,1980年代乡土小说家则较少五四作家那样的心理重负,生长在红旗下的他们没有经受过严酷的家族伦理教育。然而如同路遥所言“我们每个人是某种历史的产物”,^[12]闻一多也曾说过“我们三千年来的文化,

便以家族主义为中心,一切制度,祖先崇拜的信仰,和以孝为核心的道德观念等等,都是从这里产生的”,^[13]因而扭转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绝非像换件衣服那样轻松自如;“中国的家族制度在其全部文化中所处地位之重要,及其根深柢固,亦是世界闻名的……中国所以至今被人目之为宗法社会者,亦即在此”,^[14]因此所谓时代新人身上也会存留着传统道德观念的印痕。实际上如前言所述,封建家族也并非仅仅有着压抑个体自由和剥夺正当权益的负面效应,同时还有着给家族成员提供庇护使其免受或者少受外来侵害的积极作用。也正因此思想启蒙者在引导人们反抗封建家族伦理束缚的同时也时常会流露出怀念心理,尤其是1980年代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众多乡村青年极度渴望摆脱传统家族束缚而奔向城市谋生,但在他们真正进入城市之后却发现自身所面临的陌生感、孤独感和惶惑感,当遭遇重大挫折或者遭受不公平待遇时往往会真切地体悟到失去精神家园般的落寞和无助。面对依然有着强大威慑力和掌控力的家族,许多年轻人无力抗争而选择出走,以此种方式来摆脱传统家长权威的束缚。改革开放的时代环境也给年轻人选择此种人生道路提供了可能,以至于“出走”从而逃离传统家族伦理的牵绊成为个体实现自由的必由之路。然而“出走”也绝非易事,不仅要面对鲁迅所指出的像娜拉出走之后那样如何解决生活来源的现实问题,同时也要承受着与家族彻底割裂的心理苦痛和情感折磨。作家们从理性上明确地意识到传统家族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已经失却了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土壤而必然走向没落,但从情感上却又时常显露出依依惜别的怜惜之情,为传统家族的衰落和家族文化精神的毁灭而扼腕长叹。

由于当代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不同时期的文学对传统家族文化往往表现出迥然不同的情感态度与价值判断,1980年代乡土小说也经由对家族伦理的批判与嘲讽到家族文化情感认同与精神重建的转变过程,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

叙述者对基于血缘关系的家族伦理中积极因素的肯定以及对“家”的眷恋与皈依情怀。无论是坚守还是否弃都足以证明家族文化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不同时代的人的命运浮沉也与他们对家族的态度和认识有关。王安忆《岗上的世纪》里的知青小杨抓住大杨庄村村民宗族观念极强这一有利条件很快便得到杨氏家族的认可和接纳,从而顺利得到推荐上大学的机会。这倒并非意味着小杨本人崇信传统家族伦理,而是将之作为逃离乡村的策略,借此拉近和消弭与村民间的情感距离而博得好感和支持,事实证明此种策略确实行之有效。中国乡村中的家族基本都是以自然村落为界限不断繁衍而成的,在相对封闭的空间内容易形成强有力的家族统治,家族成员一旦被迫离开家族便会变得举步维艰,或因缺乏稳定的生活来源或因受人欺凌而缺乏安全感。

传统家族伦理道德既有着愚昧落后乃至吃人的一面,同时也有着温情脉脉的一面,对于家族中的不幸者尤其是老人也会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给予特殊照顾。在王安忆《小鲍庄》中素以仁义著称的小鲍庄将敬重老人视作不容违背的天理常伦,鲍五爷唯一的孙子因病离世后“挤了一屋老娘们,唏唏嘘溜地抹眼泪甩鼻子”,^[15]对鲍五爷的不幸遭遇充满同情。队长告诉五爷:“你老成不了绝户,这庄上,和社会子一辈的,‘仁’字辈的,都是你的孙子”,^[16]其他人也宽慰五爷“现在是社会主义,新社会了。就算倒退一百年来说,咱庄上,你老见过哪个老的,没人养饿死冻死的!”^[17]鲍秉德妻子自杀被救下后无钱医治,队长当即表态,“队里给你齐”,而众人也纷纷表示“大伙儿给你齐”。^[18]当得知捞渣在洪水来临时为了救出五爷不幸溺水而死的消息后全村人都沉默不语,他们守着县里送来救灾的吃食却连小孩都没有动手抓一块。在送葬那天全村人集体出动,“这一天,小鲍庄没有揭锅,家家的烟囱都没有冒烟”,^[19]抬棺的都是父辈人,女人们哭着给他送行。

路遥曾经明确说过：“我本身就是农民的儿子，我在农村里长大，所以我对农民，象（像）刘巧珍、德顺爷爷这样的人有一种深切的感情，我把他们当做我的父辈和兄弟姊妹一样，我是怀着这样一种感情来写这两个人物的，实际上是通过这两个人物寄托了我对养育我的父老、兄弟、姊妹的一种感情”，^[20]《人生》中高加林由背弃农村投奔城市到重回乡村时的内心忏悔和对故乡人的深情呼唤，确实显露出传统文化的温情。莫言《红高粱》中余占鳌为了严明纪律不得不将强奸民女的叔叔余大牙亲自枪毙正法，但又念及叔叔的恩情依照传统丧葬习俗将其厚葬。许谋清《补冬》中一家人其乐融融地依循传统习俗“补冬”，姐姐为了能够让家族兴盛真诚地要让小弟和小苇天天都补冬，但她明白自己早晚都会是外人，延续宗族血脉和续谱的心愿只能托付给小弟来完成。赵本夫《祖先的坟》中起首便讲述了为拯救族人而不辞艰辛带领族人南迁的“先人”的功绩，后人也一直铭记在心年年祭坟。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一部）中双水村的金家和田家这两大家族势同水火，即便是在进入社会主义之后也依然无法调和世代相传的家族纷争，家族仇恨仿佛已经根植于基因之中而成为永远也无法抹去的家族记忆。遵循着传统家族伦理规范的老一代人将家族界限看得无比神圣，严格秉承着祖辈相传的戒律，而青年一代也大都在长辈教育下墨守成规，举凡“捉奸械斗”“抢水炸坝”等家族间的争斗无论老少都积极参与其中而遑论是非曲直。孙少平到金光亮家上门给自己的学生辅导

作文这一再正常不过的举动却在双水村引起了轩然大波，“人们在惊讶之余，很是议论了一阵子”。^[21]

注释：

- [1]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51页。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2页。
- [3] [瑞士] 荣格：《荣格性格哲学》，李德荣编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年，第10页。
- [4] 郑义：《老井》，《当代》1985年第2期。
- [5] [6] 谭谈：《罪过》，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23-24页。
- [7] 朱晓平：《桑树坪纪事》，《中篇小说选刊》1986年第6期。
- [8] 朱晓平：《桑墟》，《女子们：当代青年作家佳作赏析》，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1988年，第53页。
- [9] 曹书文：《〈古船〉：当代家族叙事的经典文本》，《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 [10] 陈忠实：《文论两题》，《小说评论》1991年第3期。
- [11] 陈忠实：《四妹子》，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352页。
- [12] 路遥：《答中央广播电视大学问》，《路遥全集：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195页。
- [13] 闻一多：《家族主义与民族主义》，《闻一多全集》第二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56页。
- [14]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三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9页。
- [15] [16] [17] [18] [19] 王安忆：《小鲍庄》，《中国作家》1985年第2期。
- [20] 王愚、路遥：《谈获奖中篇小说〈人生〉的创作》，《星火》1983年第6期。
- [21] 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第450页。

〔责任编辑：李本红〕